

管建良, 黄海燕, 王茜, 等.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组态分析[J]. 体育学研究, 2024, 38(2): 106-118.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环境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组态分析

管建良, 黄海燕, 王茜, 赵树桐

(上海体育大学 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中心, 上海 200438)

【摘要】: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是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 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是创新型中小体育企业的典型代表。采用多重制度环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分析体育领域58个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 旨在揭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及其协同效应。研究发现: ①良好的政策支持构成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必要基础, 该条件缺失成为制约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培育的主要障碍。②组态分析结果显示, 存在五种高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培育路径, 并基于核心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多元组合归纳为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政策—技术补充型三种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路径。最后, 为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 对政府部门和中小体育企业提出实践启示。

【关键词】: 体育企业; 企业创新; 体育产业; 制度环境; 定性比较分析(QCA);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4)02-0106-13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428.004

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社会作用日益凸显。中小体育企业专注于体育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不仅促进了大小企业之间的融通, 还有助于构建相互依托的完善体育产业生态^[1]。中小体育企业具有融入国际体育产业链、成为体育产业领域专家的巨大潜力, 这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深入体育领域重构人、场地、设施与体育活动之间关系的背景下, 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能力成为体育产业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然而, 处于体育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生命力脆弱、高淘汰率、竞争力不足及转型升级较难等挑战^[2-3]是当前中小体育企业面临的主要考验, 这些挑战不仅源自企业内部规模小、竞争力弱和创新能力不足, 也受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及劳动力成本增加、去杠杆等外部因素影响^[4-5]。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下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提质增效; 同时, 强调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 将其

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体育市场主体的目标, 包括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及单项冠军企业。作为体育产业的生力军, 中小体育企业需积极创新, 向专一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向转型, 才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进而推动体育产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供有力支撑。提升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 不仅涉及企业自身市场定位、研发投入和组织架构的调整, 还需应对行业内外的制度环境及其规则变迁。尤其是在当前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等多重制度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如何优化整体环境, 培育更多创新型中小体育企业, 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24-0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55)。

第一作者: 管建良(1997—), 男, 江西赣州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 体育产业创新。

通信作者: 黄海燕(1981—), 男, 江苏宝应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产业政策、体育赛事管理。

基于此, 本文从组态视角构建了外部制度环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探究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创新驱动的多重影响因素, 旨在为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发展的孵化和培育提供策略性建议。

1 研究回顾与研究设计

1.1 相关研究回顾

1.1.1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内涵

尽管中小体育企业在体育市场中占据主体地位, 但学术界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对上市的大型体育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6]的个案研究。此外, “专精特新”这一中国式企业现代化的创新发展路径, 体育领域的学术研究滞后于实践进展。

第一, 中小体育企业的界定。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中,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未列明行业中, 员工人数介于10至300人的企业被归类为中小型企业。王晨曦^[7]基于该标准, 将主要从事体育竞赛、健身休闲等11大类活动的有序组织、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定义为中小体育企业。鉴于体育产业的多元性和细分化特征, 仅以员工规模作为中小体育企业的划分依据较大的局限性。从体育产业管理的实践角度考量, 中小体育企业应被定义为在员工规模、年营业额或总资产等指标上属于中等或较小范围内的体育市场相关经济实体, 这些企业在体育装备制造、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康复器械和体育服务等多个市场细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二, 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8], 创新被视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表现在新产品推出、新生产方法应用、新市场开拓、新原料发掘以及新组织形式创立等多个方面。对于中小体育企业而言, 创新发展意味着在产品创新、技术进步、资本运用等多个维度上的活跃, 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不仅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也加速壮大了企业规模, 进而推动整个体育产业链的持续优化。究其原因, 中小企业通常以对创新的高度敏感和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特征^[9], 在规模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更倾向于采取风险策略, 积极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

第三,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小体育企业而言, 成为“专精特新”企业, 是实现高水平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信部发布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 对优质中小企业进行了层次化划分, 明晰了“专精特新”企业即专注于细分市场、具有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的企业, 这些企业业务专业化、管理精细化、工艺特色化, 并且在新含量上表现突出。依据规模大小和创新能力, 可将其划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等四个层次(统称为“专精特新”企业)。从迈克·波特的竞争理论来看, “专精特新”化发展既符合聚焦战略(专精)也符合差异化战略(特新), 突出了创新与科技实力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成为我国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内涵和时代特征, 树立了创新发展的典范。2023年4月,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 体现了中央层面对体育领域企业创新能力的认可, 凸显了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并强调通过政策惠企、服务助企、环境活企等措施, 推动体育企业做精做强做大。这些企业通过其主营业务专业化、管理经营精细化、产品服务特色化以及创新效能新颖化, 已成为优化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提升体育领域基础研究能力及解决我国体育产业链关键技术问题的重要力量。由此,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需形成独特的生产和配套能力(专业化)、在管理、产品质量趋于卓越水平(精细化), 满足日益差异化的市场需求(特色化), 以及体育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新颖化)^[10]。

第四, 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企业通过维持与区域市场和产业链的密切互动, 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动力^[11], 这将促使中小体育企业在取得初期突破性创新后专注于持续渐进式创新, 以巩固和提升其在体育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涉及发展战略、研发方向、组织架构的调整^[12], 并同时考量行业内外的制度环境及其规则变迁, 以实现专精特新转型升级。

1.1.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戴维斯与诺斯(Davis & North, 1970)最早提出了制度环境的概念, 并将制度环境定义为构建生产、

交换及分配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框架^[13]。这一理论揭示了国家法律、经济体系及社会结构如何构成制度环境,以潜在且普遍的方式影响着组织和个体的行动,并对企业的决策与战略方向施加深刻影响^[14-15]。

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存续与发展、业绩表现以及战略决策的众多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包括企业的治理结构、创新活动和社会责任等^[16],对中小体育企业而言,制度环境不仅塑造其生存空间与发展潜力,亦指引其创新发展方向。制度环境既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契约条例等书面、被正式认可并实施的规章制度,规范并约束行动者的行为^[17],维护企业活动的基本秩序;涵盖非正式制度,如传统、习俗、社会规范及地域特性等,尽管未经书面化,却广泛存在并约定俗成,对企业行为产生更为微妙的潜在影响^[18]。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引领企业向健康发展方向前进,倒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及附加值^[19]。要放大企业创新的外部效应,使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稳固地位,需要政府、市场及社会各方协同努力,如构建完善的企业创新发展激励与服务体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保护知识产权等^[20-21]。随着制度环境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由多样性引入的制度环境复杂性^[22],强调不同制度环境之间的差异、冲突、依存和互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塑造组织与个体行为。在此过程中,中小体育企业也必须持续适应环境变化,确保与区域产业政策、市场机会及产业链发展进程相适应以实现创新发展^[23-24]。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时期,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将受到多重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相关决策需重视企业面临的外部环

境变化。

1.2 制度环境驱动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设计

在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小体育企业作为市场中最具活力的参与者其创新进程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由政策、市场、技术及文化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环境中展开。鉴于此,本文基于经典的企业战略分析PEST环境分析并且参考专精特新企业孵化^[25-26]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境,将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及文化环境作为制度环境的综合分析框架(图1),旨在深入理解中小体育企业在多元制度环境下的创新培育机制。该框架核心在于揭示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如何协同构建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反映了政策环境将为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提供方向引导与支持效果,市场环境通过高效流通加速创新资源的配置与集聚,技术环境中推进中小体育企业的技术升级与跨界资源赋能表现,文化环境则通过价值观塑造与商业信用培育状况,为中小体育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驱动创新环境。

1.2.1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铺设了基础框架,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是政府部门为推动中小体育企业发展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导向和工具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我国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实现了“双重利好”效应,既提升了主要行业内创新型企业的数量,又优化了其质量^[25,27]。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重点产业布局及产学研合作等措施致力于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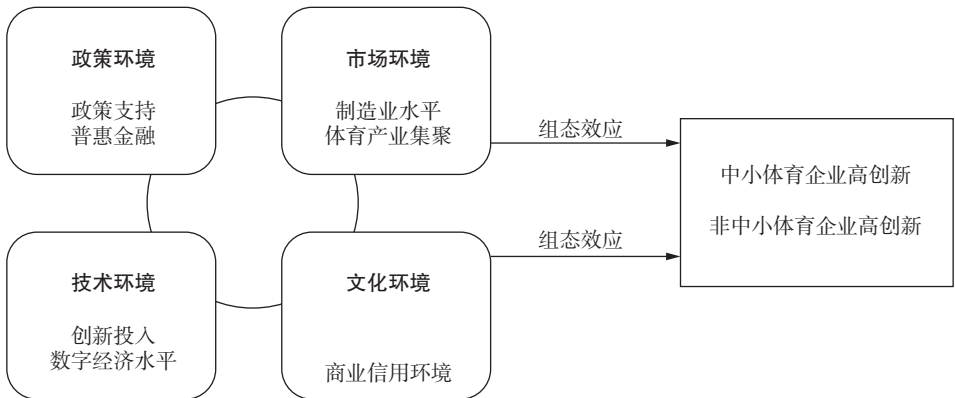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环境驱动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ri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MEs in sports

化创新创业的发展,表明政策成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进程中的引导者和协调者,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中小体育企业的外部稳定性,而且激发了其持续创新的活力^[28]。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创新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29],体育企业不仅存在一般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共通之处,还具有体育行业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体育产业的核心在于赛事形成的竞赛表演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其价值变化迅速且稳定性不足难以沉淀为固定资产,这使得体育产业的投融资具有高风险特点。中小体育企业的融资需求满足程度相对较低,在融资可得性方面体育企业的融资难度总体偏高,这使得当前体育企业创新面临较大约束^[30]。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了政府在推广金融服务普及与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政策方向和支持强度,通过利用互联网平台与新兴技术,降低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31],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多样化融资渠道。据此,本研究选取政策支持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政策环境影响的指标。

1.2.2 市场环境

中小体育企业作为体育产业基础供应链的主体,其发展根植于地方经济体系,并受到所处市场环境和区域特性的多重塑造^[14]。市场环境作为资源配置的无形导向,不仅塑造了中小体育企业的发展路径和创新策略,而且决定了它们获取创新资源的潜能。从已有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分类来看,以运动装备和运动康复器械为主营业务的体育企业数量占据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小体育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升级对较高水平工业制造支持的迫切需求。此外,通过高效链接上下游企业集群和科研机构,产业集聚构建起体系化的创新网络,促进了产业链与价值链的紧密连接^[32],满足了企业在专业技术、人才及设备设施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这种集聚效应不仅缩短了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周期并提高了迭代效率,还通过增加地方特色产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开辟了丰富的产业空间。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数量已达86家,为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初步的产业空间布局。因此,本研究采用制造业发展水平和体育产业集聚来评估市场环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

动效应。

1.2.3 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土壤,既提供了广泛的创新投入和合作机会,也催生了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构成了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根基,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交易成本^[33]。由于我国中小体育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技术创新能力面临较大的限制,因此这些中小体育企业高度依赖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需在技术环境中探索新的生存空间和市场机会,特别是在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对区域内技术资源和知识共享的需求尤为紧迫。高水平的区域创新投入将通过减少中小体育企业创新的负外部性^[34-35],提升其获得先进技术、研发工具及专业知识的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此外,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中小体育企业面临新的增长机遇^[36]。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将促使中小体育企业以核心业务为纽带,借助外部线上平台进行跨界转型,提高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37]。即数据流通和数字平台增强了体育企业的场景服务能力,为企业接触更广泛客户群体提供机会,如线上的运动健身服务和体育用品销售的需求大幅增长,为中小体育企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本文将创新投入和数字经济作为技术环境的测量指标。

1.2.4 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作为潜在影响企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力量,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策略将产生深远影响。文化环境汇聚了区域传统、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商业信用体系等^[38],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企业的决策过程、创新能力和市场定位。尤其在以信用为纽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商业信用环境成为衡量市场经济秩序和信用体系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26]。这一指标揭示了市场运作的规范性、信用体系的成熟度与效率,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充满活力且稳定的环境为致力于专业化及技术创新的中小体育企业保持市场竞争领先地位提供了有效支撑。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使中小体育企业更易于获得社会信任及必要的资源支持,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潜力。因此,本文选取所在地区的商业信用水平作为衡量文化环境的指标。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于1987年基于集合理论和布尔运算逻辑提出^[39]。QCA方法融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优势,打破了因果关系传统的可加性假设,允许识别多样化、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该方法特别适用于揭示复杂因果关系系统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组合效应,并已在企业发展^[40]和社会治理^[41]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QCA适合本研究进行的小规模样本分析,提供了灵活的分析框架,便于处理类别变量和部分隶属问题^[42]。本研究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QCA的具体实现形式。fsQCA作为一种细致的分析工具,侧重于探究复杂条件组合如何共同作用于研究结果。fsQCA的分析步骤包括必要性条件分析和充分性条件组态分析,前者基于模糊集隶属分数矩阵预先识别出必要条件,后者则专注于评估多条件组合对研究结果的影响^[43]。因此,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旨在探究中小体育企业不同制度环境组合下的创新驱动路径,从而为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见解。

2.2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2.2.1 结果变量

本研究将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数量作为创新发展的结果变量。在我国当前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践中,各级工信部门根据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企业的评定提出了明确标准。因此,被评为体育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可视为实现较高创新发展水平。此数据来源于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共计58家企业,包括49家专精特新企业和9家单项制造冠军企业,并对它们所在省份的分布进行统计。其中,运动器械制造生产(40家)、运动医疗器械(9家)、体育场馆设施(6家)及体育服务供应(3家),基本涵盖了体育产业的主要业务领域,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2.2.2 前因条件变量

① 政策支持(Policy):综合了2012年至2022年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文件以

及各省级政府部门发布的地方性支持体育企业政策,参考郭本海^[44]对光伏产业政策的处理方法以及张范^[45]对民营企业扶持政策的量化标准,对中小企业政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建设等进行赋值,累积评估各省份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②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Finance):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评估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46-47]。

③ 制造业发展水平(Manufacture):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2)》提供的数据,包括投资增长、研发活动、新产品开发、销售和专利情况等,本文选取各省份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④ 体育产业集聚(Cluster):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区域体育产业的集聚程度,包括体育产业基地和区域产业集中度两个指标。体育产业基地数量基于截至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各省份体育产业基地数量;区域产业集聚程度参考刘军等^[32]的研究方法,使用就业人员数(万人)与行政区划面积(km²)的比例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其中就业人数根据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行政区划面积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官网。

⑤ 创新投入水平(Innovation):参考袁航^[48]、娄小亭等^[49]的计算方法,基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2》提供的地方财政在教育 and 科技领域的支出、每十万人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R&D)经费、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R&D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投入强度,以及科学技术和教育支出占比等数据构建创新投入指标,并通过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ARIMA)模型填补部分数据缺失,完成数据归一化处理。

⑥ 数字经济水平(Digital):借鉴数字经济领域高的被引文献刘军等^[50]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从信息化发展、物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这三个关键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以评估2022年各省份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

⑦ 商业信用环境(Trade):使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CEI)指数^[51],该指数综合考虑了信用投放、

征信系统等多项因素,反映城市商业信用的整体状况。在具体计算上,基于省会城市数据通过平均插值法估算各省份2022年的商业信用环境,旨在评估中小体育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

2.3 变量校准

在进行fsQCA分析时,首先执行模糊集校准以确保数据的适用性及可比性。鉴于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的偏态特性,本文借鉴罗拥

华^[52]的做法,将0.9分位数、均值和0.1分位数作为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及完全不隶属的界定阈值。对部分数据值恰为交叉界定阈值的数据统一加上0.001,避免数据在计算过程中被程序自动删除^[53]。如表1所示,结果变量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6,均值为1.87,标准差为3.43,显示出不同省份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外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性。

表1 描述性分析与变量校准
Tab.1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calibration of variables

变量	描述性分析				模糊值校准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完全隶属点	交叉隶属点	完全不隶属点
创新发展	0	16	1.870	3.430	8	1.870	0.001
政策支持	0	528	95.120	110.108	257.500	135.500	6.500
普惠金融	312	1 313.860	385.690	175.540	425.460	373.460	315.600
制造业水平	0.001	0.063 15	0.013	0.001	0.026	0.016	0.003
体育产业集聚	0.001	5.222	1.124	1.164	3.224	1.620	0.002
创新投入水平	0.0128 2	0.992	0.262	0.217	0.649	0.324	0.016
数字经济水平	0.081	0.882	0.252	0.217	0.612	0.284	0.089
商业信用环境	70.523	87.085	75.862	3.825	82.834	77.323	71.213

3 结果分析

3.1 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通过fsQCA来解析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必要外部制度环境要素,并重点识别关键制度条件及其对立集。根据QCA方法论,若某一条件的一致性水平达到或超过0.9,便可将该条件视为对应结果的必要条件^[54]。利用fsQCA软件进行必要性条件分析,将创新发展定义为结果变量,并以7个条件作为前因变量,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无单一条件的一致性指标超过0.9,表明中小体育企业的创新发展是由多重制度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政策支持的缺失(非集)被识别为非高创新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一致性0.901,覆盖度0.909)。这表明非高创新驱动的中小体育企业普遍面临政策支持不足的问题。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制造业发展水平、体育产业集聚度、技术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水平以及商业信用环境的缺失(非集)的一致性指标均超过0.8,反映出这些因素也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具有一定的影响。

3.2 组态结果的充分性分析

运用fsQCA方法进行真值表分析,本研究对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在高创新驱动及非高创新驱动背景下的制度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首先细致检验案例分布,并根据样本量确定适宜的频数阈值。在充分性分析中,一致性水平作为关键评估标准,其接受的最低标准及计算方法与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有所差异,条件组态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通常大于0.75^[55]。考虑到样本数量的限制,遵循Rihoux等^[43]的研究建议,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 PRI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临界值设定为0.7,频数阈值设为1,以降低矛盾组态的影响。

3.2.1 高创新发展的驱动组态

利用fs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分析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的组态路径,得到复杂解、简单解及中间解。通常,中间解作为报告的首选,因其包含与理论及实践知识相符的“逻辑余项”,展示出较强的解释力。对比简约解和中间解,可识别仅在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作为边缘条件,而在两种解中均存在的条

表 2 单一必要条件的分析结果
Tab.2 Analysis results of individual necessary conditions

前因条件	高创新发展		非高创新发展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政策支持	0.789	0.773	0.268	0.614
~政策支持	0.606	0.261	0.901	0.909
普惠金融	0.774	0.669	0.315	0.638
~普惠金融	0.581	0.266	0.836	0.896
制造业水平	0.716	0.657	0.303	0.651
~制造业水平	0.620	0.275	0.840	0.874
体育产业集聚	0.738	0.702	0.302	0.674
~体育产业集聚	0.658	0.287	0.866	0.885
创新投入	0.697	0.638	0.348	0.685
~创新投入	0.612	0.272	0.842	0.917
数字经济水平	0.824	0.689	0.350	0.685
~数字经济水平	0.623	0.290	0.841	0.918
商业信用环境	0.773	0.643	0.335	0.653
~商业信用环境	0.584	0.273	0.817	0.894

注：~ 代表逻辑运算的“非”

件则定义为核心条件。鉴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存在多种解读视角,故将前因变量均设置为存在或缺失“Present or Absent”,形成真值表。遵循“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的原则进行对照嵌套,得到5种高创新水平发展驱动路径的制度环境组态。结果显示,整体解的一致性为0.793,覆盖度为0.690,每种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及整体一致性均超过0.75的可接受标准(表3)。并基于核心条件所属维度,进一步将这5种组态归纳为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及政策—技术补充型三种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的环境构型(图2)。这些组态表明,制度环境组合对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具有较高的驱动作

用,如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影响十分显著,具体案例详见图3。

第一,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环境构型中(图2-1),政策支持、体育产业集聚及创新投入是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即使面对普惠金融发展不足、制造业基础薄弱及数字经济水平不高等挑战,这一环境构型依然能有效促进中小体育企业创新。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775,表明其在解释创新发展驱动上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原始覆盖度为0.338,意味着在所有高创新驱动的案例中该路径占比为33.8%。在此组态下,政策支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活动。同时,体

表 3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驱动的制度环境组态
Tab.3 Higher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Enterprise in Sports

前因条件	高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				
	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	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	政策—技术补充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政策支持	●	●	·	⊗	⊗
普惠金融水平	⊗	●	●	●	●
制造业水平	⊗	·	·	·	⊗

续表 3

前因条件	高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					
	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		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		政策—技术补充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体育产业集聚	●	●	⊗	⊗	·	
创新投入	●	●	⊗	⊗	·	
数字经济水平	⊗	●	●	●	●	
商业信用环境	⊗	·	⊗	·	·	
一致性	0.775	0.933	0.831	0.754	0.848	
原始覆盖度	0.338	0.465	0.276	0.335	0.288	
唯一覆盖度	0.071	0.159	0.032	0.060	0.026	
总体一致性		0.793				
总体覆盖度		0.690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该条件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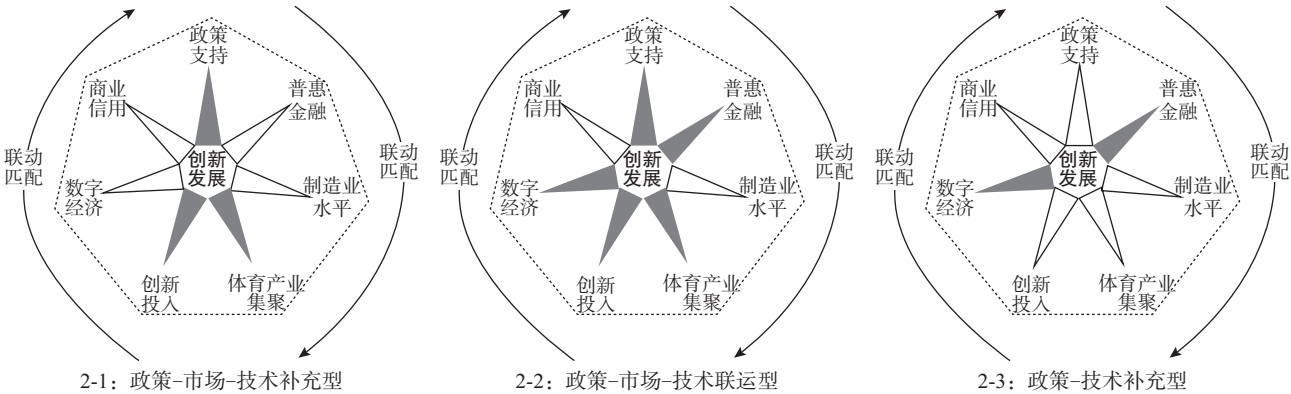


图2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的三种核心构型

Fig.2 The core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riven by innovation of SMEs in Spo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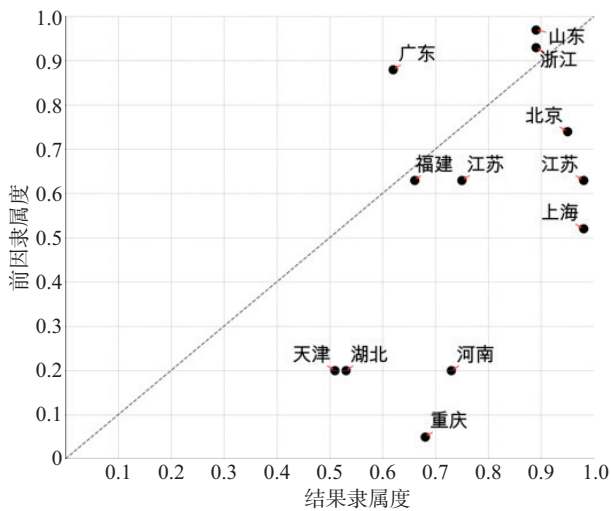


图3 中小体育企业高创新驱动的典型案例

Fig.3 Typical cases of high innovation driven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Es in Sports

育产业的集聚对创新起到了显著的引导作用,促成

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产业生态系统。区域创新投入的增加,加强了中小体育企业获取创新知识的能力,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多层面的实现途径。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为山东省和重庆市等地区。以山东省为例,作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省份,该省在推进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尤其是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孵化与成长方面,展现了政策支持的效力与体育市场基础的深厚。2023年,山东省财政部门安排的工业转型发展资金达到20.28亿元,重点技术攻关资金高达38亿元,同年工业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14.6%显著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较高的财政投入旨在支持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其中不乏对体育产业的大力扶持。此外,通过实施技术改造提升行动、产业链提升工程,以及推出工业强县激励政策等措施,山东省不仅解决了产业链中的主要短板和关键部件

问题,还有效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在体育产业领域,山东省积极建设了体育产业园区、孵化基地和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引导中小体育企业沿着“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前行,显著提高了体育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为体育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促进了体育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发展。因此,该省在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数量上位列全国前列,涌现出16家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第二,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环境构型(图2-2)揭示了在政策支持加强、普惠金融水平提升及体育产业聚集度增加的背景下,结合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与商业信用环境,对于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培育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首先,一个积极主动的政策环境为企业提供了解决问题、减轻负担及获得支持的有效途径,增强了中小型体育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市场适应能力。其次,市场环境的优化提高了中小型体育企业在生产与运营过程中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可靠性,促进了企业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最后,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技术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培育与巩固技术优势的基础,推动了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有效孵化。这一组态能够解释约46%的样本案例,其独特性对案例解释力的贡献大约为15%,以浙江省与江苏省为代表。以浙江省为例,强大的企业促进政策环境、繁荣的市场条件及持续的技术创新共同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孵化与成长的生态环境。政策方面,浙江省政府推出了多项旨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措施,如优化政策包与要素保障清单,安排省级财政资金以支持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不仅为体育企业提供了直接及间接的财政支持,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2024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进一步优化政策包与要素保障清单,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 023.6亿元,以支持市场主体的创新发展,培育新的生产力,强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催生具有核心技术与市场竞争力的高成长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浙江省科技厅推出了包括“科技惠企10条”与“科技助稳20条”在内的多项科技创新政策,以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体育企业创新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此外,

数字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工程也成为浙江省政策支持的一个重要方向,推进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进程,深化了浙江省体育产业名录数据库与全域户外运动智慧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体育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至2023年,浙江省在体育领域拥有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体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特种体育护具生产、复杂体育装备制造等领域取得的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制度环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的有效支持以及其在推动产业生态良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作为文体科技领域的集成方案提供商,大丰实业(前身为余姚市视听器材厂)自1991年成立至2023年,该企业获得了667项专利,包括64项发明专利,在全球成为第四家获得国际TüV认证的数据处理系统企业,并被评为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第三,政策—技术补充型。在政策—技术补充型环境构型(图2-3)中,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核心驱动力,尤其是在地方创新投入不足和核心技术环境缺乏的背景下。这一路径展现了普惠金融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共同构成了“政策—技术”驱动型路径,该路径由三个不同的制度环境组态(3a、3b、3c)组成。

首先,在3a组态中,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作为双重核心动力,配合政策支持和制造业发展,突破了市场和文化的约束,促进了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孵化。该路径的一致性指标为0.754,原始覆盖度达到0.335,以福建省作为典型代表。福建省的政策支持在多个层面体现,涵盖了成本降低、创新促进、关键要素保障、问题解决以及转型助力等方面。截至2023年9月末,福建省累计投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技改贷款及乡村振兴贷款总额达1 500亿元,惠及约2.3万家主要为民营小微企业的经营主体。科技创新投入方面,福建省的科技活动人力资源投入在2020年位居全国前列。在此政策及技术支持下,福建省孵化出一批在体育新材料领域展现出强大创新能力的专精特新企业。

其次,3b组态中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商业信用环境起到辅助作用,该路径的一致性为0.848,解释了28%的案例。典型的省市包括北京和天津,其中北京市通过政策措施有效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如

对中小企业首次贷款的补助以及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降费奖补措施,显著降低了中小体育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北京地区的智能供应链通过快速匹配供需,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大型企业满足中小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加速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这些政策和措施促进了中小体育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培育出多家在体育赛事直播/转播、运动医学整体解决方案、辅助训练系统等领域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最后,3c组态展示了在体育产业集聚和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下,即便面对制造业布局较少的挑战,也能推动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的培育。该组态的一致性指标为0.848,凸显了体育产业集聚和商业信用环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以上海市为典型案例,孵化出一批在智能康复设备、健身器材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领域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这些企业利用上海市的商业信用环境优势和体育产业集聚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成功突破市场竞争和行业发展瓶颈,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3.2.2 非高创新发展的驱动组态

产生非高创新发展水平的组态包括两条路径,即组态4和组态5,总体一致性达到0.781,总体覆盖度为0.952,说明这两条路径能够解释95.2%的非高创新水平案例(表4)。

组态4反映了在缺乏政策支持和良好信用环境

表4 非高专精特新体育企业驱动的制度环境条件组态
Tab.4 Non Higher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MEs in Sports

前因条件	非高创新驱动路径	
	组态4	组态5
政策支持	⊗	⊗
普惠金融水平	⊗	
制造业水平	⊗	⊗
体育产业集聚度	⊗	⊗
创新投入		⊗
数字经济水平		⊗
商业信用环境	⊗	⊗
一致性	0.958	0.976
原始覆盖度	0.760	0.678
唯一覆盖度	0.203	0.021
总体一致性	0.781	
总体覆盖度	0.952	

下,中小体育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这类政策和文化环境的空白区域,企业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同时不完善的信用体系阻碍了中小体育企业获取关键资源 and 市场信任,限制了它们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组态5揭示了较低的制造业水平、较少的创新投入以及受限的商业信用环境等制约因素构成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核心短板。这意味着中小体育企业不仅面临薄弱的制造业基础和创新资源的缺乏,还需应对商业信用环境不佳等挑战。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中小体育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优势,其创新发展及转型升级面临较大阻碍。

中小体育企业非高创新驱动的典型地区包括吉林、辽宁、新疆、内蒙古、青海、黑龙江、贵州、甘肃、山西及陕西等。这些省(自治区)外部制度环境的驱动力需要进一步加强,应致力于营造有利于中小体育企业深入钻研和精细化作业的外部环境,并增强对中小体育企业市场导向和支持力度。此外,积极构建创新协同、产能共享及供应链互联的产业生态系统尤为关键。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推动中小体育企业紧随技术变革脚步,在创新探索中寻求并把握市场的竞争优势,从而孵化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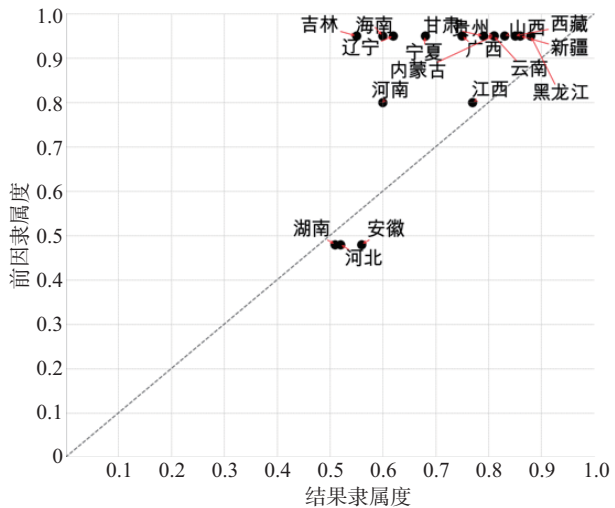


图4 中小体育企业低创新驱动的典型案例

Fig.4 Typical cases of low innovation driven in SMEs in Sports

3.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研究关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驱动路径的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依据杜运周等^[56]提出的评价标准,通过调整一致性水平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具体而言,研究在输出条件组态结果前,将一致性阈值由0.75调整至0.8,并维持

其他处理方法不变,新的组态结果见表5。对比分析发现,除组态2由于提高一致性阈值而筛除了一组案例外,其组态数量和存在条件均未发生改变,条件组态分析的结果与原组态分析结果一致,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5 高专特新企业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组态(稳健性检验)
Tab.5 Configu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for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robustness test)

前因条件	组态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政策支持	●	●	·	⊗	⊗
普惠金融水平	⊗	·	●	●	●
制造业水平	⊗	●	·	·	⊗
体育产业集聚	●	●	⊗	⊗	·
创新投入	●	●	⊗	⊗	·
数字经济水平	⊗	·	●	●	●
商业信用	⊗	·	⊗	·	·
一致性	0.775	0.901	0.831	0.754	0.848
原始覆盖度	0.338	0.483	0.276	0.335	0.288
唯一覆盖度	0.071	0.082	0.032	0.060	0.026
总体一致性			0.801		
总体覆盖度			0.672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采用组态分析方法,在多重制度环境框架下探讨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并深入分析了影响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孵化的多重因素。第一,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阻碍是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这限制了企业的创新加速能力。第二,促进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孵化的五种制度环境组态,并根据核心条件将其归纳为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及政策—技术补充型三种组合制度环境。第三,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政策环境和技术环境对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提供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培育的新理论视角、扩展了体育领域专精特新企业的相关研究,并通过识别影响这些企业创新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以及如何促进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为外部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体育领域的证据。

4.2 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为政府部门和中小体育企业提供了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一是,基于本地体育产业的特性,鼓励和支持体育产业创新项目的开发,加强对体育企业深入攻关体育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的战略性引导,推出针对性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培养计划,为具有创新潜力的中小体育企业提供财税优惠、金融支持力度等措施缓解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二是,在具有体育领域技术和品牌优势及发展潜力的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与品牌建设的支持,为中小体育企业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提升品牌影响力提供助力。三是,引领建立体育产业科技创新交流平台,促进产业链内领军企业与中小体育企业在攻关核心技术问题上的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生态,增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动力,以此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战略不仅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更是实现专精特新转型升级的关键。企业应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外部资源,加强技术研发和差异化竞争策略,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加速在体感技术、赛事转播制作、智能体育场馆、电子竞技和体育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技术突破,实现市场竞争中的梯度提升。此外,还需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团队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与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加速体育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商业化应用。

参考文献:

- [1] 李恩华,李松璞.制度均衡视角下中小微体育企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3,44(6): 68-74.
- [2] 赵轶龙,鲍明晓,朱凯迪.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推进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研究的方向与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3): 46-54.
- [3] 袁园媛,黄海燕.我国体育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三板挂牌体育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5): 550-560.
- [4] 邹天然,徐子渊,周亚美,等.“双循环”场域特征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科学决策,2022,29(3): 123-133.
- [5] 陈颇,刘波.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3): 288-294.
- [6] 薛未,曹可强.融资方式与体育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及优

- 化路径——基于沪深A股与新三板体育企业的实证分析[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1(4): 118-124.
- [7] 王晨曦. 网络嵌入与中小体育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2022.
- [8] GALUNIC D C, RODAN S. Resource recombinations in the firm: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the potential for schumpeterian innov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12): 1193-1201.
- [9] 宋清, 刘奕惠. 市场竞争程度、研发投入和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出——基于风险投资调节的条件过程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21, 36(10): 182-192.
- [10] 董志勇, 李成明.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与路径选择[J]. 改革, 2021, 37(10): 1-11.
- [11] 王伟楠, 王凯, 严子淳. 区域高质量发展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 2023, 44(2): 32-44.
- [12] 许金富, 王海霞, 路来冰, 等.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路径研究——基于沪深A股和新三板企业的fsQCA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8): 47-53, 91.
- [13] DAVIS L, NORTH 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0, 30(1): 131-149.
- [14] PENG M W, WANG D Y L, JIANG Y.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5): 920-936.
- [15] 郭海, 赵晶. 公司实际控制权、社会资本控制链与制度环境[J]. 管理世界, 2014, 30(8): 160-171.
- [16] MEYER K E, ESTRIN S, BHAUMIK S K, et 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entry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1): 61-80.
- [17]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8] 李雪灵, 张惺, 刘钊, 等. 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29(11): 84-96.
- [19] 朴英爱, 周鑫红, 于鸿.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发支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 2023, 45(1): 70-79.
- [20] 蒋依依, 金山, 薛涛. 政府如何支持小微企业获得大型体育赛事的红利? ——来自北京冬奥会的案例经验[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3, 46(4): 13-25.
- [21] 丁俊凯, 孙晋海. 财税政策促进体育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体育上市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体育科技, 2023, 59(4): 109-113.
- [22] 王锋正, 刘宇嘉, 孙玥. 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与资源型企业转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5): 114-123.
- [23] 段艳玲, 刘兵. 资源整合对我国体育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4(1): 66-71.
- [24] 王先亮, 郭学庆, 周婷婷. 价值链与创新链耦合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的分析[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8(6): 24-30.
- [25] 曹虹剑, 张帅, 欧阳晓, 等. 创新政策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40(11): 135-154.
- [26] 敦帅, 毛军权. 营商环境如何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3, 25(2): 78-92.
- [27] 吴先明, 马子涵.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1): 31-42.
- [28] 王志文, 张瑞林, 李凌. 我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构成、问题检视与构建思路[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5): 31-38.
- [29] 任缙, 高婷婷, 石鑫, 等.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效应分析及机制检验[J/OL]. 软科学: 1-11 [2024-04-0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30825.1640.002.html>.
- [30] 朱启莹, 徐开娟, 黄海燕. 资本市场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用机制、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12): 35-49.
- [31] 齐红倩, 张佳馨, 陈苗.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 2023, 45(10): 23-40.
- [32] 刘军, 王佳玮, 程中华. 产业聚集对协同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7, 32(06): 89-98.
- [33] 王晓旭. 技术创新、政府扶持与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以检验检测行业为例[J/OL]. 科技进步与对策: 1-10 [2024-04-0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31207.1358.007.html>.
- [34] 马嘉楠, 周振华.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补贴、企业创新投入与区域创新活力[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 34(2): 53-60, 99.
- [35] 康露, 黄海燕. 体育与科技融合助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逻辑、机制及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5): 39-47.
- [36] 任波, 黄海燕.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7): 22-34, 66.
- [37] 任保平, 李婧瑜.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2): 1-7.
- [38] 彭伟, 殷悦, 沈仪扬, 等. 创业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9): 121-134.
- [39]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 33(6): 155-167.
- [40] 阮添舜, 屈蓉, 顾颖.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下企业何以实现数字创新[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23): 82-91.
- [41] 张国兴, 林伟纯, 郎玫. 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地方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基于30个案例的fsQCA分析[J]. 管理评论, 2021, 33(7): 326-336.
- [42]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 [43] 伯努瓦·里豪克斯.QCA设计原理与应用 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杜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 [44] 郭本海,李军强,张笑腾.政策协同对政策效力的影响——基于227项中国光伏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36(5): 790-799.
- [45] 张璠,王竹泉,于小悦.政府扶持与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22,66(1): 116-132.
- [46] 郭峰,王靖一,王雪,等.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R].北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2021.
- [47]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4): 1401-1418.
- [48] 袁航.创新驱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9.
- [49] 娄小亭,朱祖平,黄若谷,等.多重制度逻辑对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升级的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8): 74-88.
- [50] 刘军,杨渊璧,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36(6): 81-96.
- [51] 安家骥,刘国亮.营商环境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FsQCA的定性比较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23,41(2): 101-110.
- [52] 罗拥华,李一凡.轻资产公司融资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QCA的实证分析[J].会计之友,2021,39(18): 91-96.
- [53] FISS P 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2): 393-420.
- [54] RAGIN C C.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 [55]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 [56] 杜运周,李佳馨,刘秋辰,等.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QCA方法: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管理世界,2021,37(3): 180-197,12-13.

作者贡献声明:

管建良:提出论文选题、收集分析数据、撰写及修改论文;黄海燕:设计研究框架、修改论文;王茜:修改论文;赵树桐:提出修改建议。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SMEs in Sports: 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in Sports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GUAN Jianliang, HUANG Haiyan, WANG Xi, ZHAO Shut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s and Health Industr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EMS) in sports are vital force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sports enterprises that use special and sophisticated technologies to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being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innovative SMEs in Sports.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g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utiliz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amine 58 "little giant" firms in the sports field. The goal is to reveal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SMEs in Sports and their synergistic effects. The findings are: ① Sound policy support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Es in Sports, and its absence becomes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in Sports. ② The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reveals five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in Sports, which, based on a diverse combination of core 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innovation pathways for SMEs in Sports: policy-market-technology supplement, policy-market-technology linkage, and policy-technology supplement. Finally, to promote more SMEs in Sports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owards specialized and sophisticated enterprises that produce novel and unique produc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or governments and SMEs in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enterprises; corporate innovation; sports industr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